

海外学者论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谢来辉/文

[提 要] 近年来,西方的一些政界人士和学者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明确提出这种观点,并推动了一系列对华强硬措施。拜登政府似乎也继承了这一观点。通过系统地梳理相关研究,文章发现,海外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术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而是认为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文章认为,西方一些人士误判中国挑战国际秩序,其原因在于:一是对中国传统的国际秩序观的误解;二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崛起国的传统偏见垄断了讨论相关问题时的话语权。文章还梳理了海外学者对西方国家误判中国意图导致的危险后果提出的相关警告。

[关键词] 国际秩序 中国崛起 话语权

一、中国挑战了国际秩序吗?

最近几年来,围绕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世界秩序愿景,在西方国家一直流行着一种错误的认知。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在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存在某种具有敌意并且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并试图成为新的世界霸权。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对自由国际秩序形成全面挑战。^①

这种观点已经对政策实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宣称,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试图按照自身偏好来改造国际秩序,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寻求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取

代美国”,并“塑造一个有悖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世界”。^② 2018年10月,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中再次提及相关观点,指责中国“试图将其势力扩展到全球各地”,认为中国开始“重塑其在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力”,“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并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使之符合他们的利益”。^③ 拜

① G. John Ikenberry, “The Next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4, 2020, pp. 133 - 142.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p. 27, pp. 45 - 46.

③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October 4, 2018,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政府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这一立场。例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曾在公开场合声称“中国正在向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发起挑战。”^①除美国外,欧盟对中国与既有国际秩序的关系也存在类似的担忧,不过与美国相比显得较为温和。欧盟在2019年3月发布的文件《欧盟与中国战略前景》中提到“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支持有时是有选择性的,并且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着不同的理解。”^②在这份文件中,欧盟首次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正在日益凸显,这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从实践层面看,中国真的挑战了国际秩序吗?未来中国将会成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吗?对于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显然并不存在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从文献来看,海外学者其实对此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而且其结论显然并不支持前述观点。充分了解相关文献的观点,特别是深入分析相关错误观点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于我们更好理解未来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经验研究认为中国更接近于“现状维护者”

近年来,海外有一大批学者对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普遍的研究结论都是认为中国对改革和完善当前的国际秩序有一定的诉求,但是并没有意愿、也没有采取行动来挑战和威胁这一秩序。^③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是西方系统研究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权威学者。他在2003年就全面评估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情况,认为中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Status Quo Power),因为中国其实接受甚至捍卫现有秩序的许多原则,尽管不是所有的原则。^④

多年来,江忆恩的观点一直为后续的研究

所持续证实和接受。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崛起:东亚的和平、权力与秩序》一书中,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康灿雄(David C. Kang)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将是亚洲地区的稳定性力量。东亚地区存在特殊的等级秩序,周边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威胁,中国越是强大,东亚地区的稳定越是能得到保障。康灿雄通过考察过去六个世纪东亚体系中的互动,发现不是权力而是利益和身份认同等两个因素影响了现今东亚的国际关系秩序。^⑤美国布朗大学教授谢德华(Edward S. Steinfeld)一直认为,中国并不会对西方构成威胁,因为中国的发展与西方的规则并没有重大冲突。^⑥

不少学者都达成了如下共识,即中国的崛起战略是选择留在现有体系内,而不是挑战现有体系。2005年,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机构研究员兰马克(Marc Lanteigne)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从避免参与国际组织转向拥抱国际组织,放弃了先前的制度孤立主义。他认为,中国没有为了成为大国而走上领土扩张和政治经济主导的传统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即合理利用现有制度作为确立大国地位的路径。^⑦新加坡学者李明江也认为,中国选择

① Norah O'Donnell,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on the Threat Posed by China", <https://www.cbsnews.com/news/antony-blinken-60-minutes-2021-05-02/>.

② European Union, "EU - China Strategic Outlook: Commission Contribution to the European Council", 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china/59758/node/59758_en.

③ Mingjiang Li (ed.), *China Joins Glob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nd Contention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2; Mingjiang Li, "Rising from Within: China's Search for a Multilateral Worl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ino-US Rel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 17, No. 3, 2011, pp. 331-351.

④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⑤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⑥ 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⑦ Marc Lanteigne,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lternate Paths to Global Power*, London: Routledge, 2005.

了体制内崛起(rising from within)的道路,并不会对现有秩序构成威胁。他认为,尽管中国在多边外交中会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在许多情况下是选择性的),并且会寻求在全球多边议程中增加影响力,但是中国会因为各种考虑和限制而不太可能会完全颠覆或者在全球层面重塑多边机制。他认为,中国很可能会延续过去十年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中采取的行为方式:参与、接触、在符合中国利益的领域推动合作、避免承担过分的责任、反对伤害其利益的倡议、在提出宏大倡议方面保持克制。^①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2017年12月发表的文章《中国的崛起与国际体制:中国寻求颠覆全球规范吗?》中全面评估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军控与裁军、人权、人道主义干预以及气候变化和海洋法等主要领域的参与情况,以及中国对国际规范所持的态度。他的结论认为,除了在极少数被西方完全主导的领域,中国总体上并没有挑战国际规范。黎安友指出“中国的行为没有表现出在国际规范体系中推广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也没有表现出对世界秩序的另一看法。如果有一个更大的模式,那就是中国往往是表现为一个保守的大国:它抵制美国及其伙伴以不利于中国及其伙伴的方式塑造霸权的行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美国一直在持续积极努力塑造国际体制演变的未来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相比美国更像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status quo power)。”“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试图影响这一秩序,但是并不是将其推翻或者做出根本的改变。”他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出于自身利益(self-interest)的考虑,因为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并且会基于自身的利益采取行动,而并不会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更不会试图颠覆这一秩序。^②

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文(Michael D. Swaine)是美国新一代的中国问题

专家。他强调,要想评估中国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必须对中国的观点以及中国长期以来涉及“自由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的政策和做法进行近距离考察,就像学者们过去曾经做过的那样。^③史文的研究认为,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体上遵守了全球治理的正式规则和结构。他写道“认为中国自2008—2009年之后对全球治理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而且这种新态度包含推翻现有的自由国际秩序——的论点,在中国所有的公开消息来源中几乎找不到任何支持。”^④在他看来,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已经融入国际制度体系。尽管将来中国的立场可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但是中国最终只会加强而不是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

面对现实,一些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也倾向于对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角色进行更加谨慎的评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题为《美国的领导力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的文章中指出“总体而言,中国的行为并非试图完全抛弃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而是致力于在从中获益的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终结。”^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最近

① Mingjiang Li, “Rising from Within: China’s Search for a Multilateral Worl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ino-US Rel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7, No. 3, 2011, pp. 331-351.

② Andrew J. Nathan, “Self-interest Shapes China’s Policies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East Asia Forum*, 19 December, 2017.

③ 《美学者:中国从未想推翻现有国际秩序》,参考消息网,2016年3月14日,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6/0314/1099618.shtml.

④ Michael D. Swaine, “Chinese Views on Global Governance Since 2008-9: Not Much New”,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March 1, 2016,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chinese-views-global-governance-2008-9-not-much-new.

⑤ 约瑟夫·奈《美国的领导力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载王缉思主编《国际战略评论2017》,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几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是会寻求对抗还是会融入当前国际秩序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中国可以融入当今的自由国际秩序。伊肯伯里认为,最终的答案取决于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说,“开放的和大致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一体体系的未来取决于中国。但是中国的选择也取决于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如何行动起来以改革和更新既有规则和制度。实际上,有理由认为中国将继续积极寻求融入一个扩展了的和经过重组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随着实力的增加,中国与现有多边主义制度的互动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他写道“在全球均势变动的条件下,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不仅是综合实力上的,而且从方式上来看,中国也会运用新的或者替代的多边主义来挑战或者改变既有的由西方主导的多边制度,出现所谓的“竞争的多边主义”(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②他进一步认为,“竞争的多边主义”存在两种常见的基本类型:机制转换(regime shifting)和竞争的机制创建(competitive regime creation),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制度变迁的过程。在基欧汉看来,竞争的多边主义“似乎是世界政治中一个重要且一般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现存的主导制度无法实现他们的利益时,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将替代性的多边组织作为寻求自身利益的战略手段。

2018年5月,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布了题为《中国与国际秩序》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针对战后秩序采取的政策日益走向积极。目前,中国已加入数百个重要的国际机构,逐步加强了对多边活动与规范的直接和间接支持,并表示将致力于加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该报告指出“从过去20年来看,中国没

有对抗或破坏国际秩序,而是有条件地支持国际秩序。”^③

除上述观点外,还有一些知名学者对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发表了更加积极的看法。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经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提出“中国有能力在推动构建包容性的国际秩序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贸易、援助等方面更有作为。”^④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关系专家、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奥利弗·施廷克尔(Oliver Stuenkel)认为,中国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现有体系的支持者,以避免世界秩序走向无序。他指出“断言新兴大国的一举一动都是以修正主义战略为指导的想法是偏狭的,具有误导性。”他认为,中国或许会尝试改变西方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但是并不一定要改变该体系背后的规则和规范。^⑤在施廷克尔看来,中国不会削弱现有秩序,而是在维护和支持全球现有机制的同时,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建立起一些新的国际机制作为补充,促使新兴国家能够表达新的思想。在施廷克尔看来,中国将对未来几十年里的世界秩序做出很大贡献,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将为

①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43 - 344; G. 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3, 2011, pp. 56 - 68.

② [美]罗伯特·基欧汉《竞争的多边主义与中国崛起》,曲博译,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20—26页。

③ 报告认为“在其核心,美国和中国正在竞争塑造全球体系的基础——支配国际政治的基本思想、习惯和期望”“这最终是一场规范、叙事和合法性的竞争。”Michael J. Mazarr, Timothy R. Heath and Astrid Stuth-Cevallos,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RAND Corporation, May 21, 2018,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423.html.

④ 《阿玛蒂亚·森:中国有能力推动构建包容性国际秩序》,中国新闻网,2016年2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6/c_128756484.htm.

⑤ Oliver Stuenkel, *Post - 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New York: Polity Press, 2016.

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他认为,就目前来说,中国是新兴大国中唯一能够肩负起重塑世界秩序重任的国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将导致全球转向一个“后西方世界”,它将会更加繁荣,相比此前的任何秩序,全球范围的贫穷状况都将得到大幅改善。^①

三、误判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两个根源

习近平在2015年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愿景已经日益明晰,从“和谐世界”到“新型国际关系”,并明确倡议共同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既不是要重建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也不是要重走西方发达国家争夺霸权的邪路。

但是,当前西方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仍然偏执地认为,中国正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这种错误的执念背后有很多原因,从学理上来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根源。

(一) 对中国的世界秩序观的严重误解

一些西方学者断章取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大同”与“天下”等词误解为中国试图要重新建立以自己为霸主的单极世界。^②甚至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2009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也大肆想象,认为中国很有可能会恢复历史上的朝贡体系。^③类似的观点层出不穷。2017年,曾担任《纽约时报》记者的霍华德·弗兰奇(Howard W. French)出版的题为《普天之下:过去的历史如何帮助塑造中国追求全球权力》的著作也鼓吹中国在恢复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并正在按照历史上的世界秩序观来追求世界地位。^④

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无疑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如果简单地把中国古代社会对理想秩序的憧憬当作中国对世界秩序的追求目标,认为其会指导当前中国的对外政策,那么这无疑是非常错误的判断。

一个典型的观点是,英国学者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概念错误地指责为中国在追求成为新的世界霸权。^⑤这显然是基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战略文化来判断中国当前参与国际事务的模式,这种观点完全脱离了时代背景。在历史上,中国周边其实还有很多国家并没有被纳入中国的政治边界之内,中国对它们只是具有文化上的吸引力。中国从来没有试图用武力征服周边的所有异族政权。为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特别强调,在中国的“世界秩序”理念中,文化疆界与政治疆界无须一致。^⑥更为重要的是,到了近现代之后,中国的这样一种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因为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而被彻底放弃了。美国著名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中国早

① Oliver Stuenkel, “Book Review: The Hundred – Year Marathon”,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9, No. 4, 2017, pp. 687 – 696.

②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Henry Holt and Co., 2015;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13.

③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2009.

④ Howard W. French, *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 How the Past Helps Shape China’s Push for Global Power*, Deckle Edge, March 14, 2017. 类似的观点也可参见 John M. Friend and Bradley A. Thayer, *How China Sees the World: Han – Centric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tomac Books, 2018.

⑤ 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 – 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2010, pp. 749 – 761.

⑥ [美]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已放弃了这种世界秩序观。他说“虽然中国的世界秩序观确实一直坚持到了19世纪90年代,但我们看到,正是在那10年中它发生了激烈的革命性变化,被彻底抛弃了。严复、梁启超甚至康有为都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西方的国际体系。……康有为后来确实具有大同的世界秩序观,但其性质毕竟与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完全不同。”“考虑到近代的中国充满屈辱感,有人会认为,与一个把中国置于很低的历史地位的国际性世界秩序相比,一个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史华慈认为“在这个问题范围内,这些东西的延续性已被从根本上打断,试图按照传统观念解释中国领导层的国际政策是无助于说明问题的。”“中国政府必须生存于一个现实的多国世界中,它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个世界,无论它最好的超国界愿望是些什么。”^①

史文在2015年初发表的文章中也指出,许多西方分析人士通过中国历史来推测强大的中国今后会如何表现以及会如何看待世界,其实这种“安装历史镜片的尝试都过于简单化,误读了数百年来中国思想和行为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历史经验不应被过分解读,它更多是体现为塑造了中国人的以下三种态度:民族自豪感加上对国际混乱局势的强烈担忧;热爱和平与自卫的国家形象加上强有力且公正的中央政府;对国际关系独特、等级分明但互利互惠的看法。^②2017年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愿景:天下、文化与世界政治》论文集认为,“天下”的概念为我们理解当前的国际体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这一学术概念将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与大众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联系起来。西方的指责可能忽略了这些理念在区分西式自由民主与亚洲治理模式方面的启发式价值。像“天下”这样的世界观,它着眼于一个由道德规范和公共原则统治的世界,有利于帮助人们发现和批判现有世界体系的缺陷和不足。^③

(二) 崛起国必然会挑战国际秩序的理论偏见

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士之所以认为中国在挑战国际秩序,还源于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一种成见,即认定新兴国家必然会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和威胁。^④这种看法在关于中国崛起的争论中表现尤为突出。美国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最近出版了《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就把中国类比为二战前的德国。^⑤在他看来,“中国和美国在21世纪的对抗与德国和英国在19世纪的对抗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种流行的错误观点,被一位学者形象地总结为“中国在被证明无罪之前都被视为有罪”。^⑥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在很多方面的行为都在对国际秩序进行重大修正,特别是霸权国美国的很多做法都是对国际秩序的严重破坏,但是它们却很少被贴上“修正主义者”的标签。这种情况体现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严重偏见,以及国际话语权的严重不平衡。^⑦

美籍印度裔国际关系专家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撰文对西方流行的谬论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西方有关亚洲的观念中最严重

① [美]史华慈《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过去与现在》,载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301—303页。

② Michael D. Swaine, “China: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The Diplomat*, January 14,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1/china-the-influence-of-history/>.

③ Ban Wang (ed.),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Tianxia,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④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⑤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21.

⑥ Oliver Turner,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Identity, Power,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2014, p. 154.

⑦ Oliver Turner and Nicola Nymalm, “Morality and Progress: IR Narra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visionism and the Status Quo”,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2, No. 4, 2019, pp. 407–428.

的误解带有过度的中国中心论色彩。尽管地缘政治预测者一直在寻找“头号国家”,但许多人陷入了一个陷阱,就是简单地认为中美两国形成了相互竞争的“两国集团”(G2)来领导世界。但无论是全世界,还是亚洲这一地区,都没有朝着一种中国式的“天下”秩序发展,也没有接受中国儒家原则指导下的和谐的全球体系。他认为,现实很明显,“中国只占亚洲人口的三分之一、亚洲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不到一半、亚洲对外投资的一半左右,以及亚洲外来投资的不到一半”。康纳指出,亚洲确实是今天重塑世界秩序的最强大力量,但是亚洲的含义远不局限于“中国+”。^①

近年来,不少研究试图从理论上拓展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从理论上讲,先入为主地判定中国选择了修正主义的战略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早在2011年《国际安全期刊》就曾经发表了兰德·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和蒲晓宇的文章,其中提出,未来中国在后单极时代的世界秩序中可能采取的策略取决于中国对世界秩序提出的愿景,从而其最终扮演的角色可能出现三种情景。中国可能采取的三种策略分别是:(1)支持现有秩序的去合法化,中国将作为一种搅局者,对世界应该如何构建持有一种对立的观点;(2)成为现有体系的支持者,在现有规则的框架内开展工作,为全球治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3)继续逃避一些国际承诺和责任,注重内部的发展和巩固,选择性地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逐步落实其全球秩序愿景。与之对应的三种角色和世界秩序目标分别是:(1)作为搅局者,基于自身的传统文化推动一种中国的世界秩序;(2)采取支持者战略,在一个协调的体系中建立一种更完善的自由主义秩序;(3)采取逃避责任的战略,在权力分散过程中形成一种“谈判的秩序”(a negotiated order)这将是一种没有大国领导的无极化的世界。^②

德国国际政治学者马修·斯蒂芬(Matthew

Stephen)认为,新兴大国所挑战的并不是全球治理秩序本身,而是其中自由化的特征。斯蒂芬认为,新兴大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结构,其实减少了大国冲突的传统根源。这有助于将新兴大国整合到现有的治理秩序中。然而,在现有秩序的限制下,两个因素使得核心地区与竞争者围绕全球治理的政治产生了分歧:(1)新兴大国相对更集权、更少受市场驱动的国家形式;(2)新兴大国未能融入西方现有的跨国资本阶级结构。因此,与现实主义者的悲观主义预测和自由主义者的乐观主义预测都截然不同,斯蒂芬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导致形成一种兼具跨国一体化和相对更少自由化特色的混合型全球治理秩序。^③

2018年,斯坦西·古达德(Stacie E. Goddard)在《国际组织》发表的论文系统提出了新兴国家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多种不同的理想类型。他认为,现有国际制度的容纳程度以及崛起国在体系中的地位都会影响崛起国与既有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国际制度可以改变崛起国的成本,影响其机会空间,并且转变其偏好。其中,包容性更强的国际制度会给予崛起国更多的准入空间(access),从而降低其退出体系并且在体系外发起挑战的可能性^④;另外,崛起国如果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具有中间桥梁地位(brokerage),那就更有可能在现有体系外建立排他性的联盟网络,从而与现有体系相抗衡。在他看来,中国近年来建立上合

① 帕拉格·康纳《亚洲是重塑世界秩序最强力量》载《参考消息》2019年2月26日。

② Randal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 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2011, pp. 41-72.

③ Matthew Stephen, "Rising Powers, Global Capitalism and Liberal Global Governance: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ccount of the BRICs Challe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4, 2014, pp. 912-938.

④ 关于这一观点,也可参见D. Lesage and T. Van de Graaf, *Rising Power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5.

组织(SCO)、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建立亚投行(AIIB)等行为,本身并不具有修正主义和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动机,而是更多出于功能性的需求。^①

阿兰(B. B. Allan)等人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反驳了所谓崛起国必然与霸权国发生冲突的观点。他们认为,霸权秩序与霸权性意识形态和身份的分配存在紧密的联系,而不仅仅只是与军事和经济实力相关。因此,霸权国的实力衰落并不意味着霸权秩序的转型,相反秩序更有可能维持稳定,然后自身缓慢走向衰退。另一方面,崛起国的身份如果与霸权秩序并不一致,那么即使进入霸权秩序也不可能获得完全成员(full member)的地位,而且也不大可能形成反霸权的行动集团。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大可能推动一场霸权转型。^②

四、误判中国意图的危险

近年来,不少海外学者都认为,美国不应该过分夸大国外的威胁,而应该更多关注国内的挑战。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凯瑟琳·莫顿(Katherine Morton)在2016年指出,人们经常夸大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这与问题过于复杂而难以衡量有关,也往往与人们对西方秩序的衰落产生的担忧有着很大的关系。事实上,中国在即将形成的包容的、合法的全球秩序中的角色仍然有待界定。^③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近年来多次提出,美国最大的问题是要对过去的外交政策进行检讨,不能再盲目追求海外霸权。他认为,美国应该更多关注国内事务,投资建设好美国自身这个“山巅之城”。^④2021年3月,沃尔特在《外交政策》连续发表两篇文章批评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谓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观点,认为“世界想要中国的规则”,“中国也需要基于规则的秩序”。^⑤

2018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

尔福中心研究员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出版的新书《无敌》(Unrivaled)认为,美国的地位仍然无可匹敌,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都将会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完全不必因为中国的崛起而产生恐惧心理。“如果美国能够避免国外过度扩张、国内投资不足,它现在是,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内继续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⑥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2018年10月21日发表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研究所研究员奈尔·托马斯(Neil Thomas)的文章称,与最近的一些评论相反,中国并不谋求霸权或“世界支配地位”,中国与国际秩序互动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它的利益。^⑦托马斯指出,“世界大国”或“世界支配地位”似乎不大可能是中国的重点,中国注意到了苏联在冷战期间犯下的对外过度扩张和敌视美国领导的体系的错误。与其他主要国家一样,中国现在也在与国际秩序互动:它遵守这一秩序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它的

① Stacie E. Goddard, “Embedded Revisionism: Networks, Institutions, and Challenges to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2018, pp. 763–797.

② B. B. Allan, S. Vucetic and T. Hopf, “The Distribution of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s Hegemonic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2018, pp. 839–869.

③ Katherine Morton, “China’s Role in An Emerging Global Order”, *East Asia Forum*, 1 September, 2016.

④ Stephen M. Walt, *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Elite and the Decline of U. S. Primac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Stephen M. Walt,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 6–16, <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the-end-the-american-era-6037>.

⑤ Stephen M. Walt, “China Wants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oo”, *Foreign Policy*, March 31,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31/china-wants-a-rules-based-international-order-too/>.

⑥ Michael Beckley, *Unrivaled: Why America Will Remain the World’s Sole Superpow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⑦ Neil Thoma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East Asia Forum Quarterly*, 21 October, 2018,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8/10/21/chinese-foreign-policy-under-xi-jinping/>.

利益,并且它还试图在不利于其利益的地方影响这一秩序。托马斯认为,美国推动国家利益最好的办法是接受中国的崛起,同时去改善现有的国际秩序,为此“我们应该避免一场‘新冷战’”。^①

2018年11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指出,中美两国长期的国家利益在根本上是相互兼容的。对于所谓中国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势力”的说法,董云裳并不认同。她认为,对美国来说中国当然一直是“竞争国”,中国拥有长远目标,结果有可能超越美国,但她不认为中国拥有取代美国的目标。董云裳强调中美对话的重要性。她说:“如果美国找不到与中国合作的道路,我们将迎来极其困难的未来。”她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美国没有可以从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国际机制。两国经济日益密切联系起来,将美国经济从中国分离出来,美国自身将会破产。董云裳强调“意见出现分歧,有必要加强对话,寻找妥协点。美国社会在分裂政治下已经认为向对方让步一英寸也是错误的。我认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找到共同利益的解决方法。”^②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首创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认为,如果中美两国都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到中心位置,放弃对霸权的争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他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注定一战:美中如何避免坠入修昔底德陷阱》指出,中美能否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将是决定全球秩序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艾利森在结论部分特别强调中美两国同样面临突出的国内问题。艾利森认为“如果中美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位,在亚洲争霸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他建议美国必须真正理解中国想要做什么,必须制定真正的战略,并且把国内的挑战放在首位。^③艾利森强调,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不会改变,但是需要的是“有约束”的竞争,确保竞争在有底线可

循、双方能保持沟通对话的情况下进行。^④

中美两国之间同时存在竞争与合作关系。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指出,与冷战时期美苏矛盾不同,美国与热情拥抱市场经济的中国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矛盾;中美关系是既合作又竞争的;二者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冲突却可以避免。^⑤

在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基辛格建议中美应该参照“大西洋共同体”,同意建立“太平洋共同体”,并且和其中的所有国家都追求和平发展。^⑥基辛格也指出,中美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发展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是会导致两国间的竞争,还是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⑦基辛格认为,中美之间最为关键的竞争更可能是发生在经济和社会层面,而不是在军事层面。如果按照两个国家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发展的差距肯定会发生变化。但是,对于这样一种趋势,美国显

① Ibid.

② 《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说有必要摸索美中合作之路》,载日本《朝日新闻》2018年11月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8年11月5日,http://www.ckxx.net/p/129506.html.

③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How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e Thucydide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④ 刘晨、胡友松《中美需进行“有约束”的竞争——专访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载《参考消息》2018年10月9日。

⑤ Graham Allison,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li Wyne,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3, p. 38.

⑥ 还有一些美国学者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建立一些确保中美之间增加互信、消除敌意的安全框架或机制。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 - 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Lyle J.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 - China Rivalry*,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⑦ 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94页。

然可以通过自身的能力予以改变,甚至通过努力可以逆转。基辛格指出,中美关系不必是零和博弈,也不应该是零和博弈。与历史上一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当前中美之间的一些关键议题已经在本质上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双方如果达成共识可能被证明非常困难,但是如果在相关问题上推动出现冲突必将会弄巧成拙(self-defeating)。^①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的结尾部分指出了美国思维模式的极端危险性。他针对那种把中美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国与德国关系进行类比的做法,特别是对于那种认定中美之间必然发生利益冲突的认知模式提出了警告。基辛格以1907年英国外交部高官艾尔·克劳(Eyre Crowe)撰写的“克劳备忘录”为例,认为这份对英德关系进行了充满敌意的评价报告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导致了英德两国敌意的发展,因为它导致英国的外交空间极度压缩,一直到在7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②

正确理解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对于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显得极为重要。因为中美深化合作符合全球利益,而且也从根本上符合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21世纪的世界不可能由中国或美国单独某一个国家独立支撑。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2017年1月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高度依赖与中国的合作,“中美两国进行合作的世界将是一个美国的影响力得以最大化的世界”。布热津斯基强调“现在中美两国已经是世界上两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无法单独领导世界,同样美国也不能做到。用更加直白或者有些矛盾的话来说,即使是美国想要把中国孤立起来单干,也无法说服自己了。”“如果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逐渐地塑造一个比当下更加稳定的世界,显然当前的世界是极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美国的长期利益从根本上取

决于我们深化与中国的各种联系,而并不是为了所见的短期利益而将其根除。”^③

五、结语

美国2017年发布的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国是“修正主义者”,这是完全错误的,缺乏现实依据。恰恰相反,本文发现海外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术研究都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且未来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会成为挑战者,更不会试图颠覆这一体系。作为当前国际体系的构建者和受益者,中国会成为推动国际秩序走向更加包容的建设者。

西方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过于机械和充满决定论色彩,认为崛起的大国将挑战现状是理所当然的。这背后体现了一种严重的傲慢。与此同时,有些西方学者基于对中国历史上文化传统的认知,将其简单生硬地搬到21世纪的做法,也是一种缺乏深入思考的学术懒惰。但是,由于西方国家在话语权方面的垄断地位,相关的谬误还可能会占据很大的国际舆论市场。这种谬误可能会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持续产生误导,对国际秩序的未来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影响。避免这种危险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学术界和外交界需要应对的重要挑战。■

[谢来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 周艳辉)

①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②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③ Nathan Gardels, “America’s Global Influence Depends o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Gulf News*, January 1, 2017, <https://gulfnews.com/opinion/thinkers/america-s-global-influence-depends-on-cooperation-with-china-1.1954823>.